



厚德盛才，格物致知 ——中国书院规制与教学特点探微

蒋 宁 著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本书由渭南师范学院专著出版基金予以资助出版

渭南师范学院科研项目：中国教育博物馆建议内容研究，编号 201117203

厚德盛才，格物致知 ——中国书院规制与教学特点探微

蒋 宁 著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厚德盛才,格物致知:中国书院规制与教学特点探微 / 蒋宁著. — 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5639-6256-3

I. ①厚… II. ①蒋… III. ①书院—教育史—中国
IV. ①G649.29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27646号

厚德盛才,格物致知——中国书院规制与教学特点探微

著 者: 蒋 宁

责任编辑: 张 娇

封面设计: 优盛文化

出版发行: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100号 邮编: 100124)

010-67391722(传真) bgdcbs@sina.com

出 版 人: 郝 勇

经销单位: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 定州启航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248千字

版 次: 2019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639-6256-3

定 价: 4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010-67391106)

前言

书院作为传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上曾经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学术的创新都发挥过很大的作用。钱穆先生曾说：“中国传统教育制度，最好的莫过于书院制度。”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书院满足了不同层次读书人的需求，创造了层层递进的人才培养模式，建立了较完备的教育体制，为出身寒门的士子提供了求学的机会。中国古代的学术高峰与书院密切相关，一些引领学术潮流的学者曾经通过书院来传达自己的思想和学术。古代书院的兴衰与古代文化的兴衰紧密联系，它的一些人才培养的理念至今仍具有现实的意义。

唐宋以后，随着封建经济和文化的不断发展，作为一种新的教育机构，书院开始兴起并逐渐趋于繁荣。明清时期，书院又得到更大发展并逐渐取代各级官学而成为地方教育中的一种主要机构。清朝末年，随着社会制度的剧烈变革，这种教育制度虽因不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而被废止，但是从其出现到废止，历时千年以上，而且在地域分布上也遍及全国各个角落，其对于中国古代教育事业和学术文化的发展，无疑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因而，民国时期，一些学者即先后从各个角度对书院加以研究，对于探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教育和学术文化发展规律、总结古代文化遗产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由于有关史料零碎分散，兼之以当时载录清代尤其是清末各地书院情况的大量地方志尚未刊印行世，因而，无论就总体，或者就具体问题而言，研究仍然有待深入。

为此，笔者历时数年，以地方志为中心，普阅各种古籍，将有关书院史料一一钩出，并删除重复，补充异名，订正讹误，又复将之分朝分省统计，从而对各代书院建置沿革有了一个概括性的了解。在此基础上，又对历代书院盛衰原因、过程，内部结构，各代书院与科举关系，学风演变，书院和官学关系，明清时期书院取代官学的过程，以及清末废书院为学堂的历史过程等问题分别进行了探讨，重点研究了中国书院规制和教学特点，从而成本书以就正于学术界同人。

目前，我国教育体制也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化。如果拙著能在对前人研究有所深化的同时，还能对我国现代教育体制起到一些参考作用，笔者将不胜欣喜。

作者

2018年4月

目 录

第一章 书院的起源 / 001

第一节 唐代民间书院 / 001

第二节 唐代官府书院 / 005

第三节 五代十国时期的书院 / 012

第四节 书院初期功能形态 / 016

第二章 书院的发展 / 023

第一节 北宋书院发展概要 / 023

第二节 替代官学的角色与教育功能的强化 / 026

第三节 四大书院 / 030

第四节 官学运动与书院的流变 / 035

第三章 书院制度的确立 / 041

第一节 南宋书院发展概况 / 041

第二节 理学家与南宋书院的兴起 / 046

第三节 书院与理学的一体化 / 055

第四节 书院制度的确立 / 066

第五节 南宋四大书院 / 083

第四章 书院的推广与官学化 / 088

第一节 元代书院发展概况 / 088

第二节 宋遗民兴学与元代的书院政策 / 090

第三节 书院的推广与官学化 / 099

第四节 西湖书院 / 116

第五节 元代书院空间拓展与制度革新 / 124

第五章 书院的繁荣 / 135

第一节 明代书院发展概况 / 135

第二节 明代前期书院的生存状态 / 138

第三节 书院与学术的再度辉煌 / 147

第四节 书院的平民化 / 158

第五节 兴盛中的新动向 / 167

第六章 书院的普及 / 179

第一节 清代书院发展概况 / 179

第二节 晚明遗风与清初政策 / 182

第三节 书院的普及性发展 / 190

第七章 书院的改革与改制 / 199

第一节 传统书院的改革 / 199

第二节 新型书院的创立 / 203

第三节 当代书院发展概况 / 213

第八章 书院规制与教学特点回望 / 224

第一节 书院制度 / 224

第二节 书院教学特点 / 228

参考文献 / 237

第一章 书院的起源

第一节 唐代民间书院

传统的观点认为，唐玄宗时代建于朝省的丽正、集贤书院是最早使用“书院”名称的机构。其实不然，唐玄宗时代的文献就可以证明，在丽正、集贤书院之前，民间已有书院存在，最明显的例证就是今日湖南攸县的光石山书院。唐代初年出现了民间书院并且缓慢发展。

一、光石山书院

南齐永泰元年（498年），齐明帝驾崩，东昏侯萧宝卷登基做了皇帝。但他“政尚烦苛，内不修礼制，外不听臣谏，纵恣秽行，害虐生民”，搞得天怨人怒。回天无力的老臣司空张岳，长叹“齐国将亡”，遂“挂冠东门”，退隐林泉。“闻有胜境，虽远千里，未尝不一访寻”，他希望找到一个能求长生不老的地方，以避乱世之灾。当他来到湘东郡攸县（今属湖南）麒麟山时，即醉心于其“云岫回合，松萝蓊郁，泉源清冷”的环境，于是“倾家南来”，“筑坛瞻斗，旦夕诵《古洞真经》三十九章”，潜心修炼起神仙之术来。不久后的一天，忽然有一位“貌古神清，披鹤衣，步松阴”，自称是葛洪的神人前来“升坛”指点，“授以金液之诀，俾成火鼎之功”。从此，老司空就能点瓦砾为金，“密济贫病”了。到梁武帝天监二年八月十五日（503年9月21日），潜心“诵经修炼”的司空张岳，终于在“天钧铿尔，鸾鹤翔鸣”中，踏上一片从天而降的紫云，率领“全家八十余人，白日冲天”，成了神仙。因此之故，麒麟山改名司空山。又过了半个多世纪，司空张岳的两位弟子“章、马二位先生”，也来到司空山“精修道行”，并于陈文帝天嘉四年二月十四日（563年3月23日），“亦跨鹤执简登仙”。

以上这个近似神话的故事，是在发生近200年之后，由司空山年逾90

岁的道士钟仙芝讲述，并由潭州刺史苏师道记录下来的，时在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冬十月，距今已有1200余年，可谓久矣。大唐皇帝姓李，远系老子为始祖，奉道教为国教，对这种修道成仙的事自然十分重视。就在苏刺史到来前7年的天宝七年五月十三日（748年6月13日），唐玄宗“以司空全家升举异之”，下令建造规模宏敞的朱阳观作为供奉司空张岳的祠宇，并“度道士焚修”其中。据说，“每遇岁旱，居人祈祷，无不昭应”，于是“十方归从，纷若云臻”，都将司空奉为神灵。苏师道这次到其属邑攸县来，就肩负祈雨抗旱的任务。怀着崇敬的心情，德高望重的钟道士陪同刺史大人参观了青阳观及其附近的司空仙迹遗踪。以下就是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感：

自（青阳）观远近，司空遗迹尚可寻访。东南隅有秀峰十二耸翠卓立，其峰有画瓶、青牛、大莲花、小莲花、紫盖、瑞云、洞门、紫麟、远吟、隐真、回龙、白鹤，名称不一。司空宅在山之西，去观十一里，今殿宇有像，坛井基图，宛然在焉。宅左有光石山书院，故基尚存。北一里有惠光寺，前有洗药池，池水冬温夏冷，异香袭人，掬饮可以愈疾。又十里有菩提寺，寺前有池，方广二十丈，其水亦如药池，岁旱不涸，传云司空昔常于此水沐浴，今谓之仙池。池又去三十五里有隐真岩，是司空炼药时栖止之地，故崖之左右平石之上有石臼，仅二尺许，臼底微红，犹有药气。傍有石池，方广一丈，水清如鉴，中有荷花，芳华甚异，每花开，五色相间，传云司空种荷之池也。於戏，自司空发迹于兹，奇踪遗迹异址不鲜，若夫志学之士，栖心之人，寻访于兹，往往有遇焉。

苏师道和钟道士所见的司空遗迹确实充满仙灵之气，但又绝不是蓬莱仙阁，洗药池、仙池、种荷池、隐真岩皆不得视作子虚乌有，书院、道观、佛寺鼎立山中，都是真真切切的事实。因此，尽管我们不能也不必据以断定光石山书院建于南北朝时期，但玄宗时代的人既称“故基”，其存在早于玄宗时代（713—755年），即早于朝廷的丽正、集贤书院则是没有问题的，也就是说在开元六年（718年）朝省的书院还没有出现以前，民间肯定就有书院存在。这一点非常重要，它告诉我们书院最初出现在民间而不是官府这一基本事实。在这一事实面前，袁枚“随笔”之论不攻自破。

二、地方志记载的唐初书院

我们可以说，书院产生于唐代初年，最初它只是士人的读书治学之

所。从现在掌握的文献资料来看，攸县光石山书院和陕西蓝田的瀛洲书院、山东临朐的李公书院、河北满城张说书院一起，要算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书院了。

据雍正《陕西通志》卷二十七载，“瀛洲书院在（蓝田）县以南，唐学士李元通建。明弘治时，知县任文献重修”。查嘉庆《清一统志》卷二三三及光绪《蓝田县志》卷十四，李元通，蓝田县人。在隋为鹰扬郎将，归唐后高祖拜为定州总管。与刘黑闥作战，兵败被俘，严拒招降，长叹“大丈夫抚方而不能保守，尚何惕息耶！”乃溃肠死节，可谓忠烈之士。按：刘黑闥是隋末农民军首领，唐武德四年（621年）称汉东王，兴兵反唐，两年后兵败被杀。据此可知，瀛洲书院的创建时间在唐高祖武德六年（623年）之前，比官府的丽正、集贤书院早了将近100年。

又据嘉靖《青州府志》卷九载，“李公书院在（临朐）县西南，唐李靖读书处。一云靖从太宗征闽左，于此阅司马兵法”。在临朐县南一百里处，还有李靖读书台，“相传李靖微时读书于此。又云靖从太宗征闽左，因于此阅司马兵法焉”。看来，李公和临朐县关系不浅。按：李靖（571—649），京兆三原（今属陕西）人。精通兵法，曾任隋马邑郡守。归唐后，随高宗、太宗南征北战，为大唐的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深得李世民赏识，官至兵部尚书、尚书右仆射等，时称“出将入相”的文武全才。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卒于家，谥号景武。其事迹新、旧《唐书》均有记载。书院既为李公读书或研治兵书战法之所，其创建时间就无论如何也不会晚于贞观二十三年，而比官府的丽正、集贤书院早了50年左右。

张说书院，又名张相公堂，在永和县（唐玄宗天宝元年改名满城县）花阳山中。《张说相公堂记》在卷十二《山川》、卷十六《寓贤》、卷二十二《古迹》中对书院历史皆有记述，其称张说“未遇时，至满城花阳山，因见风景异常，花木蓊郁，筑室于此，以为读书之处。后人修葺完好，更名相公堂”；张说“过满城，筑书院于花阳山，以为藏修之所，后人名其居曰相公堂”；“唐张说肄业于此，书院故址见存”。滕氏距唐不远，所记当为信史，虽然文章现已失传，但书院基本情况明了清楚。

以上唐代最早的书院中，大多是士人的读书治学之所，这说明书院与书、读书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然而，又有两所书院与战争军事有关，似乎令人难以理解。其实不然。首先，隋末唐初战乱连年，读书人投笔从

戎，以另一种形式报效国家，是其社会责任感的表现，此为大势所趋，不足为怪。其次，唐代“凡习学文武为士”，士人原来就包括了学习文武的两部分人，更何况瀛洲、李公二书院的主人皆是文武双全之才。因此，初始书院与军武相连，既是特定时代的社会现象，也是士人“习学文武”的本原反映，实属情理之中。明乎此，也就能理解日后书院的军事教育和肄武书院的出现了。

三、松洲书院

民间书院出现不久，就将其服务范围从个人扩展至众人，负起向社会传播文化知识的责任，开始了传道授业的教学活动，其典型的例证是漳州龙溪松洲书院。

乾隆《龙溪县志》卷四载，“松洲书院，在二十四都，唐陈珣与士民讲学处”。据地方志记载，陈珣字朝佩，漳州首任刺史陈元光之子，遂入籍为漳州人。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年）举明经及第，授翰林承旨直学士。后“上疏乞归养，使主漳州文学，龙溪尹席宏聘至乡校，乃辟书院于松洲，与士民论说典礼。是时，州治初建，俗固陋，珣开引古义，于风教多所裨益”。唐睿宗景云年间，其父战死。守丧之后，于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年）接替父职任漳州刺史十余年，“剪除顽梗，训诲士民，泽洽化行”。开元十九年（731年），到长安考中王维榜进士，“表辞封爵，不允”。二十五年退休，“复寻松洲别业，聚徒教授”，一直到天宝元年（742年）逝世时止。谥文英。据查席宏当龙溪县令的时间是唐中宗景龙年间（707—710）。因此，松洲书院的创建当在景龙年间四年中的某一年，其时也要早于东西二京的丽正、集贤书院10余年。

由上可知，松洲书院的办学历史较长，主持人是陈珣，前期三五年间，他是以漳州文学教官的身份受聘于县令席宏的，后期六年则是以退休官员的身份“聚徒教授”的。因此，其性质就有些微的变化，前段可以视作县级“乡校”，后段则为私家“别业”，官私的成分掺杂其间，但总的来讲，龙溪县令的参与，并不能改变其民间创办的性质，只能看作是地方官员的一种个人举措。而且其因人而设的成分居多，席宏聘请上司陈刺史的归家乞养老父的儿子主持松洲院务，实难排除讨好巴结的因素，尤其是后来书院终成陈氏“别业”的结局，更能说明松洲书院是民间之物，此其一。其二，

书院创办的目的在于移风易俗，教化乡里。漳州是陈元光在垂拱二年（686年）平定闽粤之间的“蛮苗”暴动之后请求设立的，他认为“兵革徒威于外，礼让乃格其心”，设置州府与兴办学校是化民成俗最重要的两件事，所谓“其本则在创州县，其要则在兴庠序。盖伦理讲则风俗自尔渐孚，法律彰则民心自知感激”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漳州设置不久，陈珣即“乞归养”，实有帮助他的父兴学安邦的本初动因，而其以漳州文学教官身份再主附廓州治的龙溪松洲书院讲席，则正好可以实现渐孚风俗的愿望。其三，松洲书院的教学形式多样，既有针对“士民”的社会教育，又有“聚徒”授业的专门教学；教学内容则为儒家经典礼仪；教授方法是“论说”“开引”，重于启发；取得了“于风教多所裨益”的良好教学效果。

总之，松洲书院作为我国第一所教学功能比较齐全的书院，它以士民和生徒为自己的服务对象，成功地完成了从个人所有到面对公众的过渡，在书院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典型意义。从此以后，书院作为众多士人的文化教育组织，必将拥有更为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

第二节 唐代官府书院

当民间社会循着“聚书—读书—聚众读书”的路径，衍生出书院这一前所未有的士人组织之后，官府也于唐代中期，依沿汉魏以来的故事，因袭“聚藏群书”“校理经籍”的秘书省之责，在中书省推出了丽正、集贤书院这一全新的作为官府的学术文化机构，是为有别于民间书院的第二个源头。

一、丽正、集贤书院的设置

汉魏以来，国家对图书典籍都极为重视。西汉的兰台、东汉的东观皆为宫中藏书之所，设有秘书郎、校书郎等职，掌管校刊图书，订正讹误。至桓帝延熹二年（159年），正式设立秘书省，掌典图书，考核古今文字的异同。秘书省隶于九卿之一的太常卿，因其执掌禁中图书秘记，故名。魏文帝时改称秘书监，掌艺文图书之事。晋代曾一度并入中书省，但惠帝永平元年（291年）即复置秘书监，不久又改称秘书寺、秘书省，并将原属于

中书省的秘书著作改隶于秘书省。（按：著作之名取于东汉，其职责是修撰国史，即编写当代史，但当时还没有专职专员，都由他官兼领。）魏明帝始置著作郎，隶中书省专掌其事。晋因魏制，但以中书省职典中枢机要，兼职史官，事权不专，到元康二年（292年）即划归秘书省管理。至此，秘书省除了掌理国家典籍之外，又多了一项编修国史的任务。虽然不久另行成立了著作省，但它仍然隶属秘书省。南北朝时，各政权基本沿袭此制，以秘书省领著作省，管理国家图书典籍和编修国史。隋代虽改秘书省为秘书监，改著作省为著作曹，但其职责和隶属关系仍然没有改变。

秘书省的工作，不论是校勘典籍，编制目录，还是撰写国史，都离不开图书，因为这些图书的聚积，就自然形成了一些有名的藏书机构，除了上述的兰台、东观之外，还有梁武帝时的文德殿、北齐的文林馆，后周的麟趾殿，隋炀帝的秘书外阁、观文殿等。秘书省围绕这些藏书而开展的修书、校书、刊书等工作，往往很容易就演化出一些学术基地，如北周的麟趾殿就是如此。史载，北周明帝宇文毓（557—560在位）好学，博览群书，集公卿以有文学修养者八十余人于麟趾殿，掌刊校经史，时号“麟趾学”，参与其事者皆授“麟趾殿学士”之职。《通典·职官三》记载，“后周有麟趾殿学士，皆掌著述”，可见作为藏书之所的麟趾殿，已经变成了一个肩负研究使命的学术机构。

到了唐代，中国社会进入一个空前繁荣强大的时期，文化发达，书籍增多，国家仍设秘书省主图书、著作二事，这一点在专记唐代官制的《唐六典》中有明确交代，其称：“自汉延熹至今，皆秘书省掌图籍”。虽然主管大唐“书籍在秘书令”，但“禁中之书，时或有之”，除秘书省之外，门下省的弘文馆、中书省的史官、东宫的司经局和崇文馆等都有丰富的藏书。这些机构都从事与秘书省相类似的整理、校刊图书的工作。如弘文馆，太宗即位时，馆中藏书达到20余万卷，设学士“掌详正图籍，教授生徒”，参议“朝廷制度沿革，礼仪轻重”，设校书郎“掌校理典籍，刊正错谬”；崇文馆设学士“掌经籍图书，教授生徒”，设校书郎“掌校理书籍”；司经局设洗马“掌经籍”，凡“图书上东宫者，皆受而藏之”，设文学“分知经籍，侍奉文章”，设校书、正字等“掌校刊经史”。凡此种种都说明，为了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官府加大了对图书收藏、整理、校刊的工作。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中书省在开元年间又新创集贤殿书院，加入到

“刊缉古今经籍”的事业中。

集贤殿书院又称集贤院、集贤书院，它的前身是丽正书院（又称丽正殿修书院、丽正修书院）。有关集贤书院历史沿革最权威和全面的资料，是集贤院学士韦述所撰的《集贤注记》。韦述从开元五年（717年）冬“敕就”秘书省，撰续王俭的目录学著作《七志》并刊校四部书籍开始，到八年入丽正殿校勘经史，再到十三年三月任集贤院学士，亲身经历了丽正、集贤书院的创置与演变历程。至天宝十五年（756年）二月，他以院中元老身份，感怀同时之人“凋亡以尽”，而“后来贤彦多不委书院本末”，因作此书，记置院经始、院中故事、修撰史书之次及前后学士姓名事迹。此书今已散亡，唯宋人王应麟《玉海》以类书而保有其部分内容，兹据此并参考其他文献，将丽正、集贤书院的创建情况叙述如下。

丽正书院之设缘起于朝廷的一次大规模的修书行动。开元五年（717年），唐玄宗采纳大臣们整理内府藏书，续修王俭《七志》及魏征等《隋书经籍志》等目录著作的建议，命昭文学馆学士马怀素为修图书使，与崇文馆学士褚无量一起“整比”四部之书。据《旧唐书·褚无量传》记载，书时“于东都乾元殿前施架排次，大加搜写”，并“广采天下异本”传录，工作进展顺利。《新唐书·百官志》则称，乾元殿写四部书时，置乾元院使，下设刊正官、押院中使、知书官等职。六年（718年）冬，西还京师长安，迁书东宫丽正殿，置修书院于著作院，于是乾元院更名丽正修书院，设置院使及检校官，改修书官为丽正殿直学士。至此，丽正书院宣告正式成立。

二、集贤书院的职事设置与组织分工

作为官府的丽正、集贤书院，其组织比较严密。据文献记载，院中先后至少设有院使、检校官、学士、直学士、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大学士、文学直、修撰官、校理官、刊正官、校勘官、修书学士、知院事、副知院事、判院事、押院中使、待制官、留院官、知检官、书直、写御书手、画直、拓书手、装书直、造笔直、直院、校书、正字、孔目官、专知御书检讨、专职御书典、知书官、编录官、典入院、修书、修书使、刊校、校书郎39种职事，名目可谓繁多。每种职事既责任分明，各司其事，又相互配合，共同协作，维持书院的正常运作。

学士是集贤书院的核心。依官阶的高低，它有学士、直学士之分，按

职讲的不同，它又有侍讲学士、侍读学士、修书学士之别。其设无常额，凡五品以上官为学士，六品以下官为直学士。学士中选宰相、常侍各一人分任知院事、副知院事，以为院中正副长官，又设判院事一人，协助正副长官管理院务。留院官、待制官、知检官等要职都由学士充任。唐玄宗拟设大学士居学士之上，以张说谏请而作罢。至德二年（757年）曾设大学士，地位在学士之上，但两年后即罢。不为常例。学士的职责，《唐六典》有明确的记载：集贤院学士掌刊缉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其有筹策之可施于时，著述之可行于代者，较其才艺，考其学术而申表之。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经籍，月终则进课于内，岁终则考最于外。

以上刊缉经籍、搜求遗书、申表学术是秘书省固有职能的承续，而辨明大典、征求贤才、顾问应对则是集贤书院的新创。可见政府这一新设机构的职能既有发扬传统的一面，又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从中我们可以体味到大唐文化继承与开创的风采。

集贤书院学士皆一时豪俊伟杰之士，名重当时。开元年间，书院初设，学士有中书令（宰相）张说，散骑常侍徐坚，礼部侍郎贺知章，中书舍人陆坚四人，其中张说为知院事，徐坚为副知院事；侍讲学士有国子监博士康子元，太学博士侯行果，四门学博士敬会真，中书省的右补阙冯陟（冯朝隐）四人；直学士有考功员外郎赵冬（一作东）曦，门下省的左补阙韦述、李剑（亦作李子剑）、陆去素、吕向，太学助教余钦，四门学博士赵元默，校书郎孙秀良等人。唐明皇曾命画师为他们画像，刻于东都洛阳上阳宫的像亭，并分列题写御赞之语，其称张说“德重和鼎，功逾济川。词林秀色，翰苑光鲜”。称康子元“才识清远，言谈幽秘。四科文学，六书文艺”。称赵元默“才比丘明，学兼儒墨。叙述委婉，讲论道德”。称孙秀良为“蓬山之秀，芸阁之英。雄词卓杰，雅思纵横”。凡此种种，虽为褒奖之词，但若非德才兼美之士，料也难得玄宗如此之高的评价。于是可知，芸香四溢的集贤书院确乎群英荟萃，诚为“郁郁文章之苑”，堂堂“礼乐之司”。

学士之下，有两个分工比较明显的系统，一个负责“修撰文章”，以修撰官为首；一个主持“校理经籍”，由校理官掌管。修撰官、校理官之设无常员，从各衙门选人兼任，品秩与直学士相同，在六品以下。“皆以学术别敕留之”，即皇帝以学术标准决定其任免升降，若“校理精勤，纰缪多正”，

可以褒奖；若“不能详核，无所发明”，则予贬斥。校理一职，曾于贞元八年（792年）罢置，改设校书四人、正字二人，至元和二年（807年）又罢校书、正字而恢复校理。修撰官知名者有王仲丘、施敬本、赵冬曦、贺知章、孙秀良，校理官有归崇敬、郑钦说、吕向、萧颖士、卢迈、徐浩、冯定、石洪、张仲方、郑涵，校书则有范传正、丁公著、韦处厚，正字有柳宗元，皆为文学贤能之士，其中一些人后来还升入学士之列。

“校理经籍”一系，又可细分为校正制作图书、收藏保管图书，即图书生产与图书保管两条线。生产图书的职事，主要有“书直”“写御书手”，共设一百或九十人不等，缮写经籍及御书，招擅长书法者充任，“皆亲经御简”，要求较严，后来又规定要散官五品以上者子弟方可“依资甄叙”；“画直”，员额八人，掌绘画插图之事，募擅长绘画者率任；“拓书手”，设六人，掌拓印碑文石经；“装书直”，掌装订图书之事，员额十四人；“造笔直”，制造毛笔，以供院中书写绘画之用，共设四人。图书的质量，则由校书、校理、刊正、检讨、正字诸职检验把关。

保管图书的职事，主要有“知书官”，设八人，分掌经、史、子、集四库之书，“每库二人，知写书、出纳、名目、次序，以备检讨”；“编录官”，管院中经籍的编录，涉及目录之事；“孔目官”，设一人，主管院中文书档案，收贮图书；“专知御书典”，典本是掌管各种事务的杂任职，此则为官司院中御书者。

如果说，以上学士、修撰、校理各职及其主持下的图书生产、图书保管工作颇多文化学术之色而少衙门之气的話，那么押院中使一职的设置，则颇能反映集贤书院作为官府的特色。此职始设于开元年间乾元殿写书之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沿置，由宦官充任，责在“掌出入，宣进奏，兼领中宫，监守院门，掌同宫禁”。于此可知，集贤书院平日“宫禁”森严，皇帝御驾，宦官守院，高官出入，一般人难得近前，此乃十足的天子“礼乐之司”，地道的官衙威严之气。

三、丽正、集贤书院的文化学术活动

丽正、集贤书院虽为官府，但它毕竟不同于治世牧民的衙门，刊缉古今经籍的任务，顾问应对的性质，都使它远离赋税兵农的实际政务，而致力于文化学术事业的追求。综约而论，其活动大致可以概括为出书、藏书、

讲学、赋诗、顾问五个方面，兹分述如下。

第一，征求天下图书之遗逸，刊缉古今之经籍，是书院的首要任务。丽正书院的成立即缘于广“借民间异本传录”的一次征集图书活动。其后，搜访天下遗书，并将其校正刊缉，就成了院中最主要的日常工作，这从职事所设以书直、写御书人、拓书手、画直、装书直、造笔直等员额百数十人，占院中人员的绝大多数中可以得到反映。而老臣褚无量七十五岁逝世，“临终遗言，以丽正写书未毕为恨，上为举哀废朝二日”，这一充满感情色彩的记录，更昭示出刊缉经籍在君臣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第二，收藏典籍，类分甲乙，对所藏图书进行整理编录，是集贤书院中与出书同等重要的事业。院中图书包括旧底本和新写本两部分，总在数万卷以上，必须使其处于有序状态，才能有效地展开工作。因此，院中平时设有知书官等职，按甲乙丙丁区别经史子集四库之书。各库之书，“轴带帙签皆异色以别之”，以便于检讨查取。具体做法是，“经库书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钿表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书彤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书绿牙轴、朱带、白牙签”。这种“异色经别”四库之书的方法，千余年后的清代乾隆年间仍运用于纂修《四库全书》这种巨大的文化工程，可见其影响之久远。

使众多图书处于一种有序状态的工作，是在类分经史子集四库的原则指导下完成的，其结果是按照名目、次序对所有图书进行登载而形成的大量记录，此即所谓院藏图书目录。当年的院藏书目虽不留传于世，但院中所开展的这项工作及院目本身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

第三，讲论儒道，申表学术。丽正、集贤书院的讲学活动，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皇帝的“躬自讲论”。前引张说反驳陆坚罢废丽正书院之事，《旧唐书》所记甚详，其称：“时中书舍人陆坚，自负文学，常以集贤院学士多非其人，所司供膳太厚，尝谓朝列曰：‘此辈于国家何益？如此虚费，将建议罢之。说曰：‘自古帝王功成则有奢纵之失，或兴池台，或玩声色，今上崇儒重道，亲自讲论，刊正图书，详延学者。今丽正书院天子礼乐之司，永代规模不易之道也。所费者细，所益者大。陆子之言，何其隘哉’”。可知唐玄宗曾在书院与学士们讲论儒道。此正唐明皇所谓“广学开书院，崇儒引席珍”的讲学活动。第二层是学士为皇帝讲论文史而备顾问，并因此在历史上第一次设置了专为皇帝讲学的侍读侍讲之职。如开元十一

年（723年）夏天，“诏学士侯行果等侍讲《周易》《老庄》，频赐酒馔”，它是史书最明显的讲学记录。此类依托丰富藏书，延引院中饱学之士为皇帝讲学，而皇帝礼待学士的场景，张说曾有过生动的描述，其称：东壁图书府，西园（垣）翰墨林。诵诗闻国政，讲易见天心。位窃和羹重，恩叨醉酒深。缓歌春兴曲，情竭为知音。这种君臣间的学问探讨，飘逸书香，引人入胜，以致千余年以后的晚清名臣张之洞创建广州广雅书院时，还要用前两句来为其东西斋二十间号房命名。第三层是学士对写御书手、书直等人进行的教学活动。书直等百余人“皆亲经御简”始可入院写书，他们是三卫五品散官以上的子孙，入院之后月课岁考，“各有年限，依资甄叙”。我们认为这种简选、课考、甄叙即是集贤书院围绕着日常整理校刊图书工作以及学士们的研究著述而进行的一种辅助性质的教学活动。张说“位将贤士设，书共学徒归”的诗句，其所描写的就是这种以书联系贤士、学徒的教学活动。以上三个层次的讲学活动中，前两者具有较浓的学术色彩，无论是皇帝的“亲自讲论”，还是学士们的诵诗讲易，其申表学术的目的甚明，意在提倡“崇儒向道”的社会风尚。

第四，燕饮诗酒，撰集文章。燕饮诗酒是一种盛唐的文人风雅，撰集文章则是学士们应尽的分内之责。集贤书院既集天下贤能文学之士，其常常把酒载歌，燕饮诗赋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如开元十一年新建大明宫光顺门外的丽正书院落成，学士“燕饮为乐，前后赋诗奏上百首，上每嘉赏”。十三年改丽正书院为集贤书院，“群臣赋诗，上制诗序”，其时“樱花新熟，遍赐坐上，饮以清酣之酒，帘内出彩笺，令群臣赋诗焉”。这是一幅极好的君臣诗酒融乐画卷。

第五，招贤论典，顾问应对。集贤书院招揽隐滞贤才的事迹，可考证于《新唐书》张果、姜抚两人的传记。张果是著名方士，武则天时，隐居中条山，往来于山西汾阳、临汾之间。自称已数百岁，著有《阴符经玄解》一书，时人盛传其有长生不老之术，武则天遣使征召，以其居住院中，封银青光禄大夫，号通玄先生，并下诏为其画像存真。后坚请回归北岳恒山，不知所终。张果的仙逸贤能，宋元之世终于演绎成神，列为“八仙”之首，流传至今而不衰。姜抚也是以方技异能而于开元末年召至集贤书院的，兹不赘述。至于辨明邦国大典，而备皇帝顾问应对，前述集贤书院编录蒋又是一个极好的例证。贞元十八年（802年），唐德宗问及禁卫部队军策军设